

赠阅

目 录

解放初的门头沟·····	侯正果 (1)
城龙灌渠发展简史·····	赵清祯 (5)
抗日英雄刘玉昆·····	石建山 整理 (9)
李文彬的抗日活动史实·····	何建忠 整理 (12)
抗日军民三打大台矿·····	张启林 (20)
中日杨家坨煤矿的兴衰史·····	谭列飞 (22)
龙泉雾村的石锁会·····	陈 雷 (26)
发掘民族瑰宝, 继承武林传统·····	郭世雄 整理 (28)
忆接骨医师李万禄·····	张 平 (30)
门头沟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的发展历程·····	王育芝 邢振声 (33)
门头沟区的第一条旅游公路——门潭公路·····	叶叔宪 (37)
沿河城的古迹·····	赵永高 (40)
谭鑫培的墓地·····	加来顺 (44)

解放初的門头沟

侯正果

一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由北岳军区调到平西分区三分区任司令员。当时，北岳军区政委王平同志同我谈话说：“平西地区位于平绥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北。这里位于北平以西，是山区，又是我们的一个兵站基地，责任很大。你去那里要同平西地委共同搞好工作。这样，对支援、配合野战军解放北平，将有其深远的意义。”

首长谈完话，我当天交代完工作，第二天就骑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平西分区司令部驻在斋堂以南的马栏村。当时平西分区下属一个独立六团、一个独立营和三个支队。六团驻良乡、房山、涿县一带；独立营在怀来、镇边城、密云一带活动；三个支队分别在涿县、房山、阳坊一带活动。警卫连、通信连随分区机关驻马栏村。到了分区以后，我们同平西地委的孙明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袁伯森同志（地委副书记）、杨士明同志（分区副政委）等详细了解平西的情况后，感到任务很重。于是，我们便积极地抓地方部队的各项工作，积极配合野战军，解放北平。

二

一九四八年九月以后，形势发展很快。我华北十九、二十兵团在平绥线上拖住敌人、打击敌人。我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全境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入关和华北野战军联合作战。

十一月底，我东北第四、第十一纵队及骑兵师在北岳军区独立团、营、县支队配合下，先后攻克怀来、康庄，将敌第十六军和一〇四军两个师迫歼于镇边城地区，我军控制了八达岭、南口要地。

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七日，我东北第三纵队攻克了通县、马驹桥和南苑机场。第五、第十一纵队于十二月十四日攻克了海淀、香山、宛平、丰台，十七日攻克了万寿山、石景山、门头沟。第七纵队也于十五日进至丰台、黄村一带。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六时许，北岳军区来电，令我平西分区部队星夜奔袭门头沟，配合野战军，解放门头沟，保卫矿区。据当时得知，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八师驻在门头沟一带。时间仓猝，任务紧迫，我们对部队进行了简要动员，晚九点分三路向门头沟开进：一路经城子正面向门头沟中英煤矿前进；一路经西北坡向中英煤矿前进；另一路经门头沟西面的色树坟、岳家坡向门头沟中英煤矿前进。据侦察，在我军攻克石景山以北的模式口后，国民党二〇八师已仓惶向北平城溃逃。十二月十五日晨两点左右，我分区机关部分人员和独立三营的两个连占

领了门头沟矿区。三营的另两个连和分区的警卫连、通信连也于十二月十五日上午赶到门头沟。平西地委的冯佩之同志（任地委城工部长）及地委机关的其他一些同志也于当天先后到达门头沟。我们当时的任务，一是保卫矿区，担任门头沟周围的警卫；二是打扫战场，消灭国民党溃逃的散兵部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各路大军在北平外围的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之势。傅作义在北平的二十余万军队，陷于欲战无力、欲逃无路的绝境，被迫接受和平谈判。

三

当时，门头沟以矿区为中心，有市民三万多人，其中矿工有几千。那时，门头沟有大小煤窑一百多个，比较大的矿是中英矿、城子矿、西山矿和中兴矿。中英矿是英国人开办的，是个老矿。“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接替了英国人，大肆掠夺我国煤矿资源，残酷剥削压迫中国人民。

门头沟地处山区，又是老矿区，工人比较集中，便于我党开展工作。抗战时期，平西军区怀来支队、阳坊支队一直活跃在门头沟地区。北平市委很重视矿区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张鸿舜同志兼任门头沟工委书记，亲自抓工运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门头沟的人民群众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敌二〇八师溃逃前，向矿区运来大批炸药，企图破坏矿井。党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开展了护矿斗争。工人们讲：“矿井是我们用血汗开建的，矿区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用生命保护矿区的一切设施，以实际行动迎接北平的解放”。在门头沟解放前夕，工人们组织了护矿纠察队，日日夜夜站岗放哨，守卫在矿井旁，注视着敌人的行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粉碎了敌人破坏矿井的阴谋，显示了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我们进入矿区后，得到了工人群众大力帮助。有的主动介绍解放前矿上的生产情况，有的汇报谁是矿警，干过什么坏事，有的反映日本矿长的罪行，有的建议解决工人生活上的问题等等。事实告诉我们：工人群众对我们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

北平解放前，成立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同志，孙明为副主任。当时，他们都住在良乡。除军管会组织外，党内组织了门头沟区委。由冯佩之同志任区委书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北平已是严寒季节。石景山发电厂发电需要煤，市民取暖做饭也需要煤。解放初，中兴矿、城子矿都停了产。中英煤矿生产虽没有停，但上班的人并不多。十二月初，按照北平西南军管分会的指示，门头沟也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平西地委城工部长冯佩之同志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委员由地委分区干部宋恩荣和一位李同志，以及独立营营长罗邦海，政委杨同善，副政委洪军等同志担任。

军管会成立后，我们首先召集矿区、学校、商店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传达了北平军管会和北平西南军管分会立即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讨论了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的问题。围绕这一中心，我们当时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建立组织，依靠上级党政领导和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同志）以

及人民群众，开展工作。军管会组织了几个组，分别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分清好坏人，发现骨干。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工会、妇联、民兵、贫民委员会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矿区，这个昔日工人的监牢，今日顿时沸腾起来了。为了支援解放战争，为了早日解放北平人民，工人们努力地工作着。民兵站岗放哨，日夜保卫着矿井、道路、桥梁，防止坏人破坏；干部和老工人抢修设备，为全面恢复生产作准备；分管后勤工作的同志，深入商店、粮店，忙于研究保证供应，安排工人的生活。总之，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干着。从工人们兴奋的笑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解放了，为自己干”，这是工人们共同的心声，也是他们忘我工作的动力。

二、进一步抓思想，宣传党的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我们组织宣传队，到矿区、农村、学校、街道、商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约法八章”，宣传我军在各解放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宣传群众中的好人好事。宣传教育，鼓舞了群众的战斗情绪，加强了军民团结，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尤其重要的是扩大了党的影响。

解放前，门头沟矿区工人最多达到四千余人。工人们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但工资很低，难以糊口。在四千工人中，月工资五十元（伪金元券）左右的只有三人，三十元左右的只有百余人，其他工人，月工资都是二十元左右。当时，物价飞涨，粮食昂贵，一斤玉米面九角钱，一斤高粱米六角四分钱。工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伤更是无人管，病了无人问，不少人活活被饿死、冻死。门头沟有几个万人坑，名叫“活下拉”，伤员、病员没有死就拉下万人坑。万人坑内尸骨成山，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见证。我们用这些材料，教育工人，使他们提高觉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国民党二〇八师溃逃时，留下了一个京剧团，七十余人。经过做工作，他们愿意为人民演戏。在不长的时间里，赶排了《李闯王进京》、《岳母刺字》、《满江红》、《穆桂英挂帅》等剧目，在门头沟、长辛店、石景山，为军民演出十多场，活跃了解放初的文娱生活，群众反映很好。

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群众生活。解放初，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是：要全面恢复生产，必须安排好工人的生活；要有饭吃，又必须尽快恢复生产。我们始终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统一安排。解放后，不到一周，中英、城子、中兴三个大矿都恢复了正常生产。生产上去了，生活就有了着落。那时，发工资没有钱，我们计算工资以小米为单位。根据劳动强度把工资分成三个等级：普通工人一天八斤小米；职员、老工人一天九斤小米；井下工人一天十三斤小米。今天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奇迹，但当时，对长期吃不饱饭的工人来说，真是件大喜事。他们喜笑颜开，从来没有那样快活。

我们军管会的同志，还经常深入到井下和工人的家里，问寒问暖，征求意见。群众有了病，想方设法，给予治疗。昔日的奴隶，今天变成了矿区的主人，新旧社会两重天，越比越感到共产党好。关心群众生活，本来是我们应当做的事，但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作佳话传颂。他们从人民子弟兵的身上，认识了解共产党，体会着翻身解放的幸福。可见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一言一行，对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多么重要。

矿上，除正式工人外，还有从城市、农村逃来的零散人员，大约有二百余人，为了妥善

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贫民委员会认真调查，做了大量工作。愿意留下的，在矿上安排工作；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欢送他们返乡和亲人团聚。

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门头沟地区，尤其是人员集中的矿区，人心安定，秩序井然，生产正常进行。特别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平西矿务局立即成立，加强了对矿区的领导，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级决定平西三分区和通县分区合并，调我去新的单位工作。冯佩之同志留在门头沟任区委书记。在门头沟地区工作虽不到一年，但那里的山山水水，尤其是英雄的人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城龙灌渠发展简史

赵清祥

—

城龙灌渠渠首在城子，终点是卧龙岗，故名“城龙”灌渠。该渠始建于清光绪八年，系左宗棠部下名将王德榜所建。王德榜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咸丰初，粤寇扰境，与其兄吉昌毁家起乡兵伐寇，屡建战功，于咸丰五年擢任知州，同治三年升任江西按察使，同治四年转任福建按察使，同治十一年沙俄政府派军队占领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并支持阿古柏匪徒的分裂叛乱，王德榜随左宗棠进疆平叛，连战皆捷。光绪元年其母病忧解职。光绪六年再赴新疆。光绪七年入京，负责“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兼兴畿辅水利”。光绪十年越南事亟，梯率师赴难，会诸军大捷于凉山，时任广西提督。光绪十五年榜授贵州布政使，光绪十九年病故。

从以上王德榜的历史看，他在入京的第二年就建成了城龙灌渠。王德榜既为武将，为什么这样重视水利呢？《清史稿》四十二卷中记述他入疆平叛的功绩：“羌地旷，夙患狼，往往百十成群夜入幕帐噬人。德榜令将士习猎搜捕，狼患减。甘南即平，抚降四十余万。浚狄道河渠，护沃壤百余万亩。降敕褒嘉，赐头品秩”。说明他对发展水利即重视又有所贡献。

城龙灌渠是我区界内在永定河上开发最早的一条渠道，对引用永定河水灌溉农田带了一个好头，起了示范作用。所以城龙灌渠建成后，三家店灌渠、稻地灌渠、龙泉务灌渠、陇家庄灌渠、河北灌渠、付家台灌渠，以及石景山灌渠等陆续兴建。当时的城龙灌渠就是现在的主干渠、东干渠以及在葡萄咀分水的三条小支渠，基本上是由城子至卧龙岗沿着永定河边修建的。原来这些地方，因靠近永定河，大部分是薄沙地，十年九旱，产量很低，俗称“十年九不收”。因此，当时修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放淤（永定河水含沙量很高，故称浑河），改良土壤。而距永定河较远土层较好的地方，当时农民思想还很守旧，不愿浇水，所以二十多华里长的渠线，仅控制灌溉面积四千余亩。

城龙灌渠的兴建，对当地农民确是一件大好事，把原来的薄沙地改变成了土层较厚的沙胶土混合地了，即现在所谓的胶泥地，改善了耕作制度，把原来的薄沙地只能种植一季耐旱的低产作物，变成了种植小麦、玉米、水稻一年两茬的高产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但是灌渠是私人经营（系王德榜家族的私有财产），只为赚钱，不重视渠道的维修加固，以致供水没有保证，时断时续，农民生产不能稳定。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连降大雨，渠道部分被冲垮，损失较大，因无力恢复，使灌渠闲置多年不用。直到芦沟桥事变的前几年，当地的大地主刘洪瑞出自个人利益（现在门头沟区体育场所在地就是刘的庄子），联合王德榜的后代王道本组织“兴殖水利公司”，又使灌渠恢复通了水。可是永定河床历经洪水冲刷，河床下切，造成渠首引水上的困难很大，河水稍涨，临时的拦水坝即被冲

垮,既不能保证供水,又要浪费很多的压水工,加大开支。这个公司料到无利可图,股东之间离心离德,因之缺乏管理,上下游的用水矛盾无法解决,所以,名为水地而用水没有一点保证,特别是西辛秤、卧龙岗处在下游,根本见不到水。当时的城龙灌渠虽然控制面积四千多亩,实际浇上水的仅有二千零五十九亩。

二

一九四八年冬,门头沟地区解放了,农民欢度解放了的第一个春节后,头一件事就是在区政府的领导下接管了这条“巨龙”,从此结束了地主、资本家的多年统治,使大渠回到了人民手里,取名城龙灌渠。组成城龙灌渠渠道管理委员会,每一受益村出一名代表为委员,从中选出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第一任主任是大峪村的谭瑞峰,副主任是上岸村的安联元、城子镇的李光荣。主任、副主任都是不脱产,另设脱产的专职人员四人,即秘书一人、坝头三人(管水员)。办公地点设在大峪娘娘庙内。接管后,虽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当时认为第一要维修千疮百孔的破烂渠道,先行通水;第二要解决多年来未能解决的上下游用水矛盾问题。第一个问题由于农民情绪高涨,各村出人分段施工,很快就通了水,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了,上游的城子、大峪抱着多年来随便用水的老习惯不放,中下游特别是下游的西辛秤、卧龙岗又强烈要求分水班,双方争持不下。当时的区政府很重视这一工作,由秘书长付长江同志亲自起草了城龙灌渠的第一个“灌溉管理制度”,方法是由下而上按亩按色(分作物)分班拿到红旗用水,就是谁的水班把红旗插到谁要浇水的渠口或闸门,没有红旗的一律不准用水。这个办法在当时很先进,确实解决了上下游的用水矛盾,历史上从来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得到了解决。因此,城龙灌渠原来控制的四千亩地一直也没有全部浇上过水,而接管后的第一年,灌溉面积就达到了五千二百亩。

一九五〇年,也就是接管后的第二年,城龙灌渠工作主要是发展扩大水浇地面积。当时鉴于外十三的冯村、上岸、何各庄、石门营、栗元庄等村还有大块的平原旱地急待改成水地。同时,要发展水地又得先解决水源,需要把渠首以上的临时引水渠改建成永久性的引水渠,供水方能保证。这两项工程经召开水利委员会讨论通过,报请区政府批准,决定两项工程同时进行,并组织两套班子。当时城龙灌渠管委会主任是城子村李士才,由他负责修建引水渠。外十三的新开渠以冯村刘桐恩为主组织新开渠建设委员会,由各受益村派代表参加。资金来源,由于刚解放农民还很穷,只能出工,需用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全部由国家贷款支持。引水渠工程贷小米十万斤,外十三新开渠贷小米二十万斤。农民干劲很足,工程进展较快,引水工程当年就完成了。在四涧沟口(渠首上)永定河边上建了一百二十米长的水泥浆砌石顺水大坝,即解决了永定河水冲刷引水渠,又起到对引水渠的挡水作用,好象是四川都江堰的飞沙堰,从此不再受“河水涨、石坝垮(临时堆的石坝)、渠水断”的威胁,保证了大渠的正常供水。外十三新开渠工程,由于工程较大,用工又多,整个工程分五零、五一两年完成的,五零年完成的干渠(现在的西干渠),全长三千七百三十四米,五一年完成了二条支渠(就是现在的西干支渠),全长四千六百九十二米,控制面积是三千亩,到六二年全部受益,实灌面积三千二百亩。城龙灌渠总的灌溉面积达到八千四百亩,比解放前翻了两番。

一九五一年由于灌溉面积的发展,管理任务的增大,城龙灌渠除原有的四名脱产人员外,

又增加主任一人、管水员一人脱产，主任是外十三的李德仁。

一九五四年，门矿排水沟（黑河）建成，当时由门矿排出水量达0.2秒立米。为了充分利用这股黑水，于现在菜站的后边开始经邮局、区委大院东开了一条引水渠，与总干渠连通。除解决沿途二百多亩水地的供水外，每年还可引进可用水源一百五十万立米。与此同时，新开了高家园支渠（现在大峪二支渠），扩大灌溉面积三百多亩。

一九五六年，三家店拦河闸建成，闸下大峪关公渠、稻田灌溉水源被切断，为了解决这两条渠的水源问题，在矿务局机厂东、城龙主干渠上往东穿过永定河西河岔，修了一道三百米长的倒虹吸（翻水管），与稻田渠首接通。又在机厂南的城龙主干渠上开了一条渠，与大峪关公渠首连通。从此这两条渠就改由城龙灌渠供水，因此，就在同一年，这两条渠合并到城龙灌渠。灌溉面积达到六点三万亩，从此列入北京市万亩以上灌渠的行列。这时管理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改为城龙灌区灌溉管理站，站长是侯德明。

合作化以后，由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城龙灌渠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水利发展方向由平原转入丘陵和面积较大的坡岗地，由自流灌溉转入提水灌溉。因此，从一九五八年开始，陆续新建了葡王（葡萄咀至王家楼）引水渠，长四点二六公里。在这条渠上建有王八盖（现在职业病研究所）扬水站，输水渠道沿冯村北坡转到双塔，故称王双渠，渠长一点八公里。在葡王渠的尾部王家楼，还建了王家楼二级扬水站，二级扬水站的输水渠道从王家楼开始，经石门营、小园、栗元庄沿南坡脚一线到卧龙岗，取名王龙渠，长二点一公里。还建了何龙渠（何各庄至卧龙岗），渠长三点六公里。通过扬水灌溉小园、栗元庄、石门营一带的丘陵地。此外，还在大峪二支渠上建了高家园扬水站，灌溉着中门寺沟口及坡头的一些大块岗子地。总之，这一时期是城龙灌渠发展提水灌溉的鼎盛时期，发展水地面积二千余亩。但是“大跃进”盲目上马的工程，也给带来一些损失，像王八盖扬水站包括冯双渠，王家楼二级扬水工程包括王卧渠，工程均未搞完就报废了。

城龙灌渠原来都是上渠，一是渗漏量大，浪费水太多；二是渠埂容易决口，影响适时供水。在此情况下，报请市里批准，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历时两年，国家投资十万余元，农民投工二万多个工日，修建了由拦河闸至葡萄咀全长四千零五十米总干渠的防渗工程。解决方法：一部是渠首下一段和中间几小段水泥砂浆砌石块；其余是现场浇筑的素混凝土板。工程建成后，效果很好，经原河北省水文站实测，没做防渗工程前，渠道利用系数仅为0.6，修建防渗工程后，渠道利用系数提高到0.92，当年就发挥了显著节水作用。如六〇至六二三年分别用水量是三千六百七十万立米、二千三百五十万立米和二千九百五十万立米，而六三年仅用了九百三十万立米。以后多年的用水量均保持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立米的水平上。通过实践，发现这个工程也有不足之处，混凝土底板没铺垫层，板底泥土经多年渗流泥土流失形成空洞，致造成混凝土板沉陷、撕裂、脱落。加上年久失修，早已失去了防渗作用。

一九七五年冬，市里根据区里的意见，批准了潭柘寺公社的引水入潭工程，把这项工程列为市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所谓“引水入潭”，就是引用城龙灌渠葡王渠水，在何各庄龙尾巴山脚下修建二级扬水站，把水提到山上，再沿等高线修渠引入潭柘寺公社。工程比较艰巨，既要劈山修渠、又要凿山开洞。在潭柘寺公社的坚强领导下，全体社员经过二年（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工）奋战，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试水成功。完成的工程有：引水渠二

条，全长七百七十米（一级扬水站五百二十米）；输水总干渠长十四点七公里，其中涵洞二条全长一千七百七十八米（北港涵洞六百三十五米、东村涵洞一千一百四十三米）；支渠三条，全长十四点一七公里。干支渠上共有大小渡槽十六座，建扬水站二座，其中第一级扬水站实际高差七十五点九五米，设14Sn—6B/300千瓦电机泵三台（其中有备用的一台），压力管道长二百七十五米，管径500毫米，设计流量0.7秒立米。第二级扬水站实际高差一百一十一米，设14Sn—6/680千瓦电机泵三台（备用一台），压力管道二百九十米，管径500及600毫米的各半。新建6千伏高压变电站一座，3200千伏安、35千伏高压线一公里，6千伏高压线0.5公里。总投资二百七十二点七三万元，其中国家补助一百五十二万元。总计用工六十七点五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二十六点四万立方米。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引入潭的水源问题，还扩建了葡王渠（葡萄咀至何各庄村北一段），并全部进行了浆砌块石或予制混凝土板的防渗处理。引水入潭工程，从七九年正式通水，控制灌溉面积六千亩，一九八〇年即已实灌面积四千亩。

在引水入潭工程基本完成后，为了加大总干渠的过水能力，由原来通过的2秒立米增加到2.5秒立米，因此需要加大原来渠道的过水断面，提高渠埂0.5米。作法是在渠道两侧砌上两道墙（白灰浆砌块石），墙与原渠埂持平后，再砌0.5米高的白灰浆砌块石封顶，把原来的土埂包在里边。就是现在的总干渠现状。这项工程是由城龙灌区自己组织专业队修建，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〇年历时二年半完工，完成土石方0.9万立方米，其中砌石方0.7万立方米，投资二十二万元，其中国家补二十万元。

三

城龙灌渠的现状计有：总干渠一条，长四点零五公里，已全部衬砌过，但因年久失修现已损坏；干渠六条，总长二十三点七一公里，其中已经衬砌七点六三公里；支渠十七条，总长二十六点七四公里，已衬砌七点五七公里。大小渠道上共有建筑物六百三十八座（以上均不包括引水入潭工程）。包括引水入潭工程整个控制灌溉面积二点三万亩。一九八一年是最高峰，实灌面积达到二万亩。尔后，由于农业搞成本核算，高扬程水泵电费较高，农民负担很重，因此，陆续停用，到一九八三年实灌面积降到一点五万亩。解放以来，到一九八五年为止，城龙灌渠用在工程上的总投资为八十万元（不含引水入潭工程），其中国家投资五十四万元。

城龙灌渠多年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着很大作用的，近年来随着城镇建设、工副业的大发展，它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灌区内渠道纵横，林茂草丰，粮菜碧波千顷，这对生态平衡，改变城镇地区的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它又是门城地区的蔬菜供应基地。特别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旱年，也能保证农业上粮菜的稳产高产。比如：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六年中，连续干旱，而水浇地较多的永定乡，每年粮食总产量，在粮田面积逐年减少（八五年粮田面积比八〇年减少二千五百亩）的情况下，却一直保持八百万斤的水平上。又如大旱的一九八四年，永定乡的年降雨量仅三百三十九点八毫米，而粮食总产达到八百五十三点三万斤，比一九八三年粮食总产八百三十九万斤还增产十四点三万斤，这一年全区粮食总产仅二千零三十七点二万斤，而永定乡一个乡的产量就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九，这是以说明城龙灌渠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了。

抗日英雄刘玉昆

石建山 整理

宛平县游击大队长刘玉昆，1913年生于宛平八区柏峪村。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担任过村救国会主任，巡防所所长，县游击队第三中队队长，县游击大队队长。由于长期征战，刘玉昆同志积劳成疾，1943年因病逝世。时年仅三十岁。

一 投身革命

刘玉昆从小聪明好学，性情活泼，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好。他还特别擅长演家乡梆子戏，他拉起来的戏班子，演出革命戏，在当时起到了有力地宣传抗日的的作用。年青时他还酷爱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刘玉昆为人耿直善良，和蔼可亲，因为鼻子稍大，大伙儿都亲热地叫他“刘大鼻子”。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占了张家口地区，柏峪一带的土匪闹得很凶。刘玉昆和几个穷哥儿们自动组织起来为村里的百姓看山护院。这年年底，县委派宋恩庆同志来柏峪一带开辟工作。刘玉昆接受了抗日宣传和党的教育，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事业。

1938年春，八路军邓、宋支队来斋堂川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柏峪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同时组建了一支保卫政权、护送运粮队的武装——巡防所。刘玉昆担任救国会主任和巡防所所长，由于他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同年秋末，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把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的事业。

二 长操巧战

1939年春，宛平县游击队成立。巡防所的同志编入第三中队，刘玉昆任中队长。同年十月，刘玉昆奉命来到房山一带开辟工作。一天拂晓，他率三中队离开房山县长操村去开辟新的工作点。部队刚刚走出村外，便与前来扫荡的三百多名日伪军遭遇了。双方在长操村外展开了激战。日伪军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并且占据了有利地形，把游击队压在了一个低洼的小坡下。当时刘玉昆身边只有六十几名队员，三十几条“湖北造”“老套筒”破枪。面对这众寡悬殊、生死存亡的危急局面，刘玉昆沉着镇定。他冷静地环视了一眼四周的地形，果断地命令一分队队员用火力吸引敌人，自己带领其他队员借着清晨的雾气迂回到敌人身后，抢占了制高点，两面夹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不易久战，趁敌人不备真相，犹豫不决的时刻，刘玉昆带着队员安全地转移了。

三 夜袭保卫团

1940年初，宛平县地方武装的大批骨干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随军暂时撤出斋堂，到外地打击敌人，地方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先后成立了保卫团和伪政权，向我民主政府反攻倒算。为此，县委从永定河北地区调回刘玉昆的三中队，稍加补充扩大，成立了县游击大队。任命刘玉昆为大队长。在刘玉昆的带领下，县游击大队摧毁了一区川底下、柏峪台，三区黎七岭、燕家台，五区王大台、东大台、西大台等处伪政权。并配合各方面力量恢复了我抗日政权。

燕家台沟的梁家庄、李家庄的保卫团成立以来，狼狈为奸，相互勾结，鱼肉乡里，欺压民众，到处搜捕抗日干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天深夜，刘玉昆带着几十名队员摸到梁家庄村外，正赶上梁、李两庄的保卫团聚在一起开会。刘玉昆命令一部分队员跟着分队长进村，自己领着一部分队员埋伏在村后山路两旁。战斗打响了，进村的队员如下山猛虎打得保卫团四下逃窜，有十几个汉奸从村中跑出想翻山逃走，被埋伏在村后的刘玉昆一阵手榴弹轰了出去，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我方无一伤亡。三十多名保卫团的队员被游击队全部解决，给猖獗一时的保卫团以沉重的打击。

四 保卫家园

1940年秋天，日寇增兵华北，深入斋堂川一带建立据点，到外线作战，斗争形势出现了犬牙交错的拉锯局面。刘玉昆率领游击队担负起打击敌人、掩护干部、保卫抗日政权的任务。他们夜击晓息、填水井、割电线、阻截卡车、破坏公路，向敌人展开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同时，为了扩大游击区，刘玉昆常带人到怀涞、涿鹿县的江水河一带开辟根据地，征粮征款，打击日寇，清除汉奸。一天清晨，刘玉昆领着征粮的队员刚刚回到柏峪，突然，从柏峪台传来两声枪响。刘玉昆急忙带领队员奔向了柏峪台。当时刘玉昆身边只有三十来人，他带队赶到柏峪台一看，只见六十多名鬼子、伪军正在柏峪台搜捕抗日干部，有两名村干部已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目睹日寇暴行，刘玉昆眼都气红了，他朝身后一招手，便带头冲进村去，一阵猛打，敌人不明虚实，狼狈地窜回斋堂据点。刘玉昆带领队员追击十几里，打死三个鬼子，缴获两支大枪。

五 巧取军需

从1940年开始，斋堂地区人民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坚持抗战，刘玉昆率领县游击大队离开柏峪村，把部队拉到龙门沟一带的深山里。以此为依托，继续打击敌人，风餐露宿，生活十分艰苦。为了给部队和百姓弄到粮食和盐，他在各个据点里安插了我方内线关系。一天，燕家台村送出了情报，说据点里运来几车物品，米、面、盐、布俱全。刘玉昆得知后非常高兴，当天夜里他便领着二十名队员和百十名由各村民兵组成的运输队出发了。

拂晓前，队伍来到燕家台村附近。刘玉昆向前来接应的我方内线人员问明情况后，便率队进了村。在岗楼前，刘玉昆把队伍分散开，一挺机枪架在岗楼门口，一挺对准岗楼的枪眼进行掩护。运输队的队员跟着接应人员来到仓库，干掉了看守在那里的鬼子，把仓库里的东西装进麻袋运出村去。运输队走远后，刘玉昆把部队撤了下来，当敌人从梦中醒来，发

觉的时候，他们仓库里的物资早已被刘玉昆分散到各地，成了抗日军民的给养和军需。

六 伏击军官团

1943年春，县游击队配合正规军，开始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斋堂据点的敌人处在重重包围之中。这年六月的一天，沿河城地下党员老索给刘玉昆送来情报，沿河城灭了大批鬼子军官，准备明天到斋堂据点。得知这一消息，刘玉昆立即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上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在山高路险的林子台村打埋伏。当天夜里，刘玉昆带着队伍来到林子台村，在公路上埋下了几个二十斤重的石雷，随后把队伍分散到公路两旁的山上。第二天拂晓，两辆卡车从沿河城方面开来，驶进了刘玉昆的伏击圈。这时，地雷拉响了，几股浓烟过后，卡车被炸翻在路边的水沟里。没被炸死的鬼子爬出汽车躲在路边进行抵抗，刘玉昆领着队员冲下山去，打击敌人。两车鬼子军官共四十来人，被地雷炸死二十多，伤了七、八个，又被冲下山的队员打死六、七个。眼看战斗就要结束了，忽然从斋堂方向开过来两辆卡车，从车上下来五、六十个鬼子向游击队扑来。刘玉昆见敌人来势凶猛，马上带着队员撤到了山上，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了激战，鬼子摸不清情况不敢恋战。他们边打边把鬼子的尸体拖上卡车急急忙忙回到斋堂据点去了。三天后，斋堂据点的鬼子倾巢出动，到柏峪进行报复，刘玉昆早有准备，他先安排群众转移到山里，把粮食坚壁起来，然后，带着游击队绕道奔向敌人老巢——斋堂据点。当扫荡的鬼子刚刚来到柏峪村口的时候，刘玉昆已在斋堂据点打响了，鬼子怕老巢被端，便急忙返回斋堂，他们赶回据点时，刘玉昆早带着游击队撤走了。

七 尽忠报国

战争的发展锻炼了刘玉昆的指挥才能。他把麻雀战、夜袭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和运动战灵活地结合起来，带领游击队时而出击，时而夜袭，时而埋伏，神出鬼没。打得鬼子日夜不宁，胆战心惊，每到天黑，鬼子便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再出来，有的岗楼怕刘玉昆夜袭，把岗楼的门堵死，每天从岗楼顶上放下软梯，爬进爬出。只要有游击队出没的地方，敌人就不敢随意乱窜。“刘大鼻子”的名声使敌人闻风丧胆。有一回，清水据点的鬼子需要一个做饭的，伪村长找到一个人送到岗楼。一进门，几个鬼子正在打牌，看到伪村长身后的汉子，顿时给吓呆了，一会又惊叫起来：“大鼻子的来了，大鼻子的来了。”岗楼里的鬼子吓得四处逃窜。有个胆小的鬼子躲在牌桌下面竟尿了裤子。后来，经伪村长解释，鬼子才知道此人是来做饭的，只不过鼻子有点大罢了。

1943年秋，由于长期转战在深山老林，条件艰苦，缺吃少穿，刘玉昆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病。行军打仗常常气喘嘘嘘。有时，因胸闷难支，瘫软在行军路上。加之山高林密，缺医少药，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队员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他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没事”。这年腊月的一天，刘玉昆率领游击队连续拔掉了敌人在牛战的楼岭和石河的两个据点，在转回驻地的路上由于劳累过度，口吐鲜血，牺牲在柏峪村后的深山里。

刘玉昆牺牲后，为了纪念这位抗战英雄，宛平人民将他的名字刻在了“宛平抗战烈士碑”上。他的名字和事迹至今在山区人民之中广泛传颂着。

（访问贾云三、刘景春等人整理）

李文彬抗日斗争史实

何建忠 整理

抗日战争初期，在平西腹地永定河畔活跃着一支抗日的群众武装，他们到处打击日寇和投靠日寇的反动地方武装，为我军输送了大批的有生力量，在巩固和发展平西革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支队伍就是李文彬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后改称平西第一游击总队。

李文彬于一八九二年（光绪十七年），出生在门头沟区安家庄村，兄弟二人。文彬父辈家中曾养六把骡子，以贩运为生，家有房屋十六间，到李文焕、李文彬弟兄二人时，家境逐渐贫困。安家庄村处于我区山口之地，近傍大路，进山、入京之人大都从此而行，客商富贾，穷乡亲朋各色人等皆有，李文彬性格刚强、开朗、疏财仗义，不管怀揣万贯之徒，还是穷困潦倒之人，凡从此经过有求于他的，无不允允，倾囊相助，颇得各界人们的赞许。

李文彬不仅广为交往，还特别喜欢习武练枪，曾买得双筒火枪，以滋其好，后又买了步枪，经常入山打猎练枪，久之，练就一手好枪法，几乎百发百中，周围邻村闻名。

李文彬虽嗜烟成癖，但从不爱财，欺压百姓，村中各家谁有困穷，总是竭力相助，因此，李文彬受到各方推崇。“七·七”事变前，村中办学，粗识文墨的李文彬被乡亲们推举为校长，日寇入侵平西，李文彬一呼百应，“成立队伍，保卫家乡”，就可看出其在群众中的威望。

同仇敌忾 组建队伍保家乡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踏进了我区，从此，我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我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据当地老人回忆，在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一部德军西进，路过安家庄，村民们自动组织起来，使用土炮（装火药）、大抬杆枪等武器布署在村东头的高坡上，等德寇过永定河时一齐开火，打死不少敌人，后因寡不敌众，敌人攻入村庄，烧杀抢掠，安家庄被洋鬼子杀死的有三百多人，全家一个不剩的有几十户，房子被全部烧光，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安家庄瞎胡闹，打得鬼子嗷嗷叫，镇边城借火炮，北安河借火药”，安家庄村人民有这样一段反对外敌侵略的历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加激起了群众的义愤，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三七年八月，国民党卫立煌的部队在黑髯山一线和日本鬼子进行了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丢下了不少枪支、弹药，安家庄及附近村庄的群众到战场上又一次目睹了日寇的侵略罪行，他们拣起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抛下的枪支、弹药，为保卫家乡、打击敌人作了准备。

李文彬在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推动下，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把群众捡回来的枪支

弹药搜集起来，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参加的群众武装，起名为“救国会”，其宗旨是“抗击日寇，保卫家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宛平县委为建立平西革命抗日根据地，也正积极地组织抗日武装，为了使各地自发组织的群众抗日队伍能够健康地发展，共产党员魏国臣（青白口人）、贾兰波（东斋堂人，又名贾立芳）等趁李文彬扩大队伍，招兵买马之机，先后参加了李文彬组建的部队。李文彬虽然不知魏、贾是共产党员，但知道他二人是从国民党二十九军训练团出来的，当时的队伍中正缺少懂军事会打仗的人，所以，对魏、贾非常欢迎，并予以重用，让魏国臣当了第一中队的队长，把贾兰波留在身边帮助出谋划策。这为以后改编李文彬的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李文彬在当地的影响很大，上、下苇甸，陇家庄等地又有几十人投奔到李文彬部队中来，使抗日救国会很快发展为一支有二百多人的队伍。下分两个中队一个特务队：一中队长魏国臣、二中队队长张玉亮（此人上过大学，雁翅村人）、特务队长李文贤（李文彬的本家兄弟）。这样，宛平七区一支群众的抗日武装在战斗烽火中诞生了。

初试锋芒 痛歼日伪汉奸队

一九三七年十月份左右，打击投靠日本鬼子的“黑马队”。“黑马队”是张家口一带的一股土匪武装（人称黑马队），投靠日寇后，被编为西亚挺进军，经常活动在昌平区一带，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各村群众整天提心吊胆，生怕黑马队来，就连大人吓唬孩子也是说：“再哭、再哭黑马队就要来了”，小孩马上就不敢哭了。李文彬获悉黑马队的一部住在昌平区瓦窑村的情报后，和在田庄一带活动的龚长海部取得联系（龚长海过去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抗日队伍和李文彬交上了朋友，经常配合作战），决定共同打击这支糟害群众的土匪部队（西亚挺进军）。经两队商量由李文彬指挥战斗。一天的下午，两支队伍集中在我区淤泥坑村（现淤白村、距瓦窑村二十多里），晚上九点向瓦窑村前进，半夜十二点左右，完成了对瓦窑村的包围，此时敌人毫无发觉，第二天拂晓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其余的骑马顺山涧跑到他们的据点阳房去了。这次战斗李文彬部只牺牲一人，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1937年11月全歼同日伪合流的恶霸势力吕青海部，吕青海在“七·七”事变前曾当过保卫团长，芦沟桥战争爆发后他和一个姓郑的巡官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在宛平九区活动，梦想独霸一方，我党曾派人去商谈团结共同抗日，遭吕拒绝，并将我方人员活埋，投靠了敌人。原宛平县九区（现王平村、清水涧、大台、千军台一带）是通往晋察冀边区的一条重要通道，很多从北平出来参加革命的学生都从这里经过，活动在这一带的吕青海部经常屠杀我向根据地去的干部、学生，欺压百姓，调戏妇女，做了不少坏事。吕青海的弟弟吕青溪更加凶狠，桃园村有一个叫小腊姐的妇女背地里说了他一句坏话，他就把这个妇女裤子扒掉，用烧红的铁棍烫其阴毛，吕青海的大儿子才十七、八岁，只要见到那个妇女长得好看，就拉去强奸，被他奸污的妇女有二十多人。群众见到他们就胆战心惊，敢怒不敢言。九区的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找李文彬来诉苦求救。李文彬虽然过去和吕青海有一定的交往，但耳闻目睹其对群众的迫害，屠杀干部和学生，也极为痛恨。就和

贾兰坡等商量决定消灭吕青海这支祸国殃民的汉奸队。为夺取全胜，李文彬和八区的地方武装吕玉宝（煤窝村人）、田庄大村一带的冀长海部商定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并根据“吕青海部”居住分散的特点进行了分工。一天早晨，李文彬和吕玉宝、冀长海的三支队伍按预定计划分别包围了吕青海的部队，这次战斗，由于计划周密，除吕青海带其子漏网外，其余全部活捉。第二天，吕青海的岳父密告了吕及其子隐藏的地点，很快将其抓获。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王平口召开了公审大会，将吕青海和他儿子与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镇压了，给九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三道河边战日寇。安家庄村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我平西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阴谋在安家庄建立据点。李文彬派出的人员获悉鬼子和汉奸百十来人，要从永定河南道进犯。李文彬马上召集各中队长研究，分析敌人一定会从水流比较浅的地方过河，就在敌人过河时，伏击敌人。时值残冬，李文彬带队伍埋伏在枯草丛林，山石林立，易于隐蔽的山上。上午九点多钟，日本鬼子和伪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大摇大摆的沿河南岸向安家庄走来，当部分鬼子和伪军走到河中心时，李文彬一声令下，步枪、机枪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当敌人清醒过来，组织反击时，慌乱中，掷弹筒爆炸，又自伤十多名，日本鬼子挨了打，吓得再不敢前进，只得抬着死伤的鬼子和伪军撤回了据点。

李文彬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并且有了一定的战斗经验。战斗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的决心，很多人都来参加李文彬的队伍，使这支自发的群众抗日队伍逐渐壮大。

接受改编 成为正规的人民武装

一九三八年二月，晋察冀军区独立师政委邓华同志率独立师三团（后改为邓华支队）来到平西，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平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直接威胁伪华北自治区首府北平和伪蒙疆首府张家口，以及敌之两大交通命脉——平绥、平汉铁路。既可成为晋察冀北岳区之屏障，又可成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十分区的依托和后方基地。而且将成为我军向平北、冀东挺进的出发阵地。所以，邓华同志率主力进入平西后，为巩固和发展平西抗日根据地，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了团结进步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派的方针，于同年四月八日在上、下清水把部队扩编为晋察冀第六支队，下辖二、三两个团。并加紧了对地方群众抗日武装力量的团结改编工作。

李文彬自成立队伍后，积极抗日，队伍不断扩大，在成立队伍的初期，党就派魏国臣、贾兰波等共产党员参加了李文彬部，并成为该部队的骨干，把李文彬的队伍团结改编过来，对严厉打击投靠日伪的反动武装，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意义。所以，改编李文彬的队伍，不但必要，而且已成为可能，但是李部队伍成分复杂，需作大量的工作。邓华等同志经和平西根据地的地方党组织研究决定，派六支队二团副团长陈群同志去和李文彬协商共同抗日大计，经过细致工作，李文彬同意改编为平西游击第一总队，编属二团，归八路军六支队领导，李文彬被任命为平西游击第一总队队长，陈群同志为副总队长，政委李向

之。下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魏国臣、二中队长贾兰波（原二中队长张玉范调司令部当参谋）、三中队长陈仲三。从此，这支自发的群众队伍就成了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抗日武装力量。

改编以后，李文彬领导的平西游击第一总队经过整训，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多次随大部队参加战斗行动。

五月初，总队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攻打了三家店火车站，打死敌人十几名，捣毁了敌人的伪警察所，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几部电话机，天亮后，部队从三家店大街返回时，驻守在城子的敌人隔河相望，没敢行动，充分显示了大部队行动的威力。五月中旬，总队又随六支队挺进到平绥线打击敌人。总队奉命攻打下花园，李文彬召集各中队干部开会，仔细研究了作战方案，明确了各中队的作战位置及所担负的任务。晚上，各中队全部按指定位置进入了阵地，待攻击时刻一到，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一中队首先冲进了敌人据点，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有的光着身子往桌子底下钻，有的往乱草堆里藏。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我方无一伤亡，很快撤出战斗，与大部队一起返回驻地。

一九三八年六月，为支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配合冀东农村武装暴动，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邓华支队和一二〇师的宋时轮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向冀东挺进，当时邓支队的二、三团分别改编为三十三大队、三十一大队，李文彬领导的平西游击第一总队隶属三十三大队。在挺进冀东的过程中进行了几次战斗：六月初，三十三大队一营（平西游击第一总队）歼灭康庄车站日伪守敌，占领了车站，掩护主力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平绥铁路；三十三大队奉命进行了夺取兴隆县城的战斗，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的向冀东挺进。部队过白河后进行了整编，李文彬被任命为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一中队编为第二警卫连，二、三中队及警卫排补充到其它各中队。李文彬不愿久离平西和家乡，就向领导提出：“只要信得过我，就给我十来个人，我还回家乡去打日本”。司令部领导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李文彬便带李文广、李文福、李成信等十几人（大部分都是安家庄人）离开了大部队。在返回平西的路上，李文彬考虑，现在到处都是敌人的联庄、火会等组织，这么多人又都是全副武装，行动很不方便，得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先把武器藏起来，口后再回来取。听说附近有一个好交往的财主。李文彬凭借自己的名声，准备试探一下，当派人来到这个财主家时，说明：“李文彬路过这里，想看望一下×××先生，当时就受到了热情款待，并满口答应了李文彬提出的要求。这样，十几个人全都换上了便衣，分几个组向集合点妙峰山前进。李文福和其它人在路上走散后，被当地的“火会”抓住，受尽了严刑拷打，当他说明是李文彬的人时，对方马上表示了歉意，得到了款待，并让其捎信问李文彬先生好。从上边的两件事，更可看出李文彬远近闻名。经过辗转，李文彬及其它十几个人都安全地回到了平西。回来后，仍被军分区命名为平西游击第一总队番号。

假投降 待机开敌再起

李文彬带十几人回到平西后，马上又组织了有五十多人参加的队伍，队长李文彬，副队长蔡世臣、张魁武，军需岳士增，中队长李文贤，但因缺少武器，加之改编后，骨干力量都已留在冀东，再者，主力部队开往冀东后，平西的革命武装力量暂时处于薄弱状态，敌伪力量有所发展，又正当日寇集结兵力对平西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遇

到了暂时困难。为了保存实力，扩充武器，李文彬经我党上级批准采取了假投降，待机再起的方针。当时昌平阳房地区有一支伪军部队，叫“标康部队”（标康是两个伪军头目的字号），据说，这支伪军部队是张家口以北的土匪组成的，后来投靠了日本鬼子。李文彬想方设法和他们拉上了关系，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被编为“标康部队”的二团。李文彬借此机会补充了部分武器弹药，扩充了一支有一百多人的武装。但他本人从没穿过伪军的服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穿军服，他说，穿不穿，我都是中国人。在此期间，李文彬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和我们经常取得联系，待机打击敌人，保卫家乡。

三八年秋，李文彬了解到“标康部队”的六团在根据地内进行骚扰，遭到我游击队的打击溃退，回来要路过安家庄，李文彬觉得时机已到，要消灭这伙残兵败将，缴敌人的枪支弹药，装备队伍。李文彬假意投靠标康部队以后，人员武器虽然得到了一些补充，但要想消灭这个团，实力还远远不够，所以，李文彬就把全村的青壮年都动员起来，到半山坡上呐喊放鞭炮，造成声势，迷惑敌人。时间不长，敌伪“标康”六团的残兵败将在伪团长孙震的带领下，慌慌张张地向安家庄溃退下来。敌人在我平西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已溃不成军，想得到安家庄李文彬的支援，所以惊慌中无丝毫准备。敌因败退，已成散兵，李文彬利用村庄的有利地形，过来一伙伪军，就缴一伙的枪，敌人直到被缴了枪，才明白李文彬不是他们的人，又听到满山坡的人已把他们包围，只得束手就擒，伪团长骑马过来后，被村民李大仓一把扯下马来，缴了他的枪。这样，李文彬带领群众没费一枪一弹，就把“康标”部队六团四百多人都给收拾了，大获全胜。在处理俘虏和被抢来的财物时，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俘虏愿意留下来的，补充部队，不愿留下来的，听从自便回家，但是不许再当汉奸、土匪给日本鬼子办事，同时，对三个罪恶大的汉奸，就地镇压。李文彬还派人到这伙伪军所经过的村子张贴告示，让群众认领自己被抢的东西。通过这次消灭“标康”部队，李文彬的队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较大改善。而日本鬼子自知中了李文彬假投降的计谋，对李文彬及安家庄的群众更加恨之入骨。安家庄的李成明在门头沟下煤窑，一次回家的路上流露出自己是安家庄的人，被警戒队抓住，打得半死，差点送了性命。日本鬼子下令，凡是安家庄的老百姓都是李文彬的同伙，是土八路，格杀勿论。

李文彬在消灭了“标康”部队以后，把队伍带到了太子墓、下马岭一带进行整训，通过整训，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时刻做好打击敌人的准备。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鬼子为保卫北平，企图消灭我平西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想在我区永定河和清水河沿岸主要村庄建立据点，就先派出一小股部队来勘察地形，李文彬侦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干部研究，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伏击的地点选在安家庄村东头的高地上。这里距河边二百多米，地形好，便于隐蔽。第二天拂晓，李文彬把队伍埋伏好后，又派人把村东敌人所必经的木桥拆了三孔，然后严阵以待。上午九点来钟，几十名敌人，大摇大摆地扛着机枪和上了刺刀的步枪从河对岸向安家庄走来，当敌人发现桥头已被拆了几孔，无法通过时，就暴跳如雷，下水过河，李文彬看到时机已到，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发，敌人有的被打死在桥上，有的被消灭在河中，岸上的敌人马上卧倒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被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后来鬼子来了一部分援兵，但摸不清对岸李文彬有多少部队，没敢过河，抬着被打死、打伤的鬼子撤退了。战后的几天，敌人在王平村一带的桥下拉